

## 《文学笔记》的阿多诺<sup>〔\*〕</sup> ——“奥斯维辛之后”的诗学与网络文学

○ 孙士聪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指向网络文学的阿多诺文学批评可以简约为“奥斯维辛之后”的诗学与“奥斯维辛之后”的现实两个层面,前者意味着在经验、语言与世界之间确立批判视域,后者则将批评实践植根于文学与世界的现实土壤。“奥斯维辛之后”的文学世界无限敞开,阿多诺的网络文学批评应当秉持文学批判立场以及文学对于个体生存的关照。

〔关键词〕《文学笔记》;阿多诺;网络文学;奥斯维辛之后

如果阿多诺活在当下,他将如何面对网络文学?是否会像当年遭遇女大学生在课堂上向他裸露上身那样而遽然身心俱碎?还是在网络文学世界中发现批判同一性逻辑的新非同一性力量而想象某种乌托邦的可能性?抑或像他的学派传人霍耐特所论,将阿多诺与中国(网络文学)联系在一起原本就属极为错位<sup>〔1〕</sup>的无稽之谈?对于这样一位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来说,的确有太多的可能我们无法设想。然而,既然阿多诺早已展开其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并屡屡与中国问题相互碰撞与激发,那么无论愿意与否,他都将无可避免地遭遇到当下网络文学。事实上,正像其文化工业理论渐次遭遇中国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美学理论遭遇日常生活审美化、音乐理论遭遇流行音乐,阿多诺之遭遇中国网络文学将同样分享批判哲学与本土现实之间理当欢迎的思想“杂交”,<sup>〔2〕</sup>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植根于阿多诺大量、丰富、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sup>〔3〕</sup>之中。面对新的文学现实,想必这位决绝的批判理论家不会扭头自顾、缄口不言。当然,将《文学笔记》的维

作者简介:孙士聪(1972—),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美学与文论。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4WYB029)、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一般项目(项目编号:ICS-2014-B-08)阶段性成果。

度引入网络文学论域,并非精英主义的怀旧或自恋,而毋宁说是从虚拟的阿多诺之问一窥现实的网络文学批评。

## 一、奥斯维辛之问

奥斯维辛是阿多诺终生念兹在兹的历史基点,面对 20 世纪如此巨大的人类灾难,阿多诺追问:“奥斯维辛之后,诗人何为?”他的回答凝练醒目: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些广为传播的格言式判断自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和明确的美学指向,然而,如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尚属野蛮,那么,在“奥斯维辛之后”更后面的今天,网络文学及其创作又岂止“野蛮”?如果阿多诺再世,他无疑将陷入尴尬之中,而对此的深思则需要追溯至关于“奥斯维辛之问”的哲学思考。

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问”从属于“非同一性”哲学规划,建基于《否定辩证法》与《启蒙辩证法》的理性主义批判之中。“奥斯维辛之后”的断言较早出现于《文化批评与社会》:“文化批评在文化与野蛮的辩证法的最后阶段找到其自身: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is)野蛮的”;<sup>[4]</sup>至《否定辩证法中》,不仅奥斯维辛之后的写诗,而且一切文化、甚或批判奥斯维辛的文化,都属垃圾。<sup>[5]</sup>依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只要孳生奥斯维辛灾难的同一性逻辑不被根除,那么,奥斯维辛再现的可能性就是无法避免的。对于既存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奥斯维辛与商品意识形态分享相同的理性工具地基;对于处身其中的个体来说,“错误的生活无法过得正确”;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无差异”的写诗及其诗学都难免成为“社会水泥”。“奥斯维辛之后”的写诗是否野蛮与人的正确生活是否可能,伦理学的追问指向既定现实中的人的真正自由及其现实根基。概言之,批判必须扩展到社会整体,正如阿多诺在与卡尔·波普尔争辩中所强调的那样,这既是否定辩证法的理论要求,也是经验优先的要求<sup>[6]</sup>——革命在西方的流产、法西斯的胜利、红色苏联、大萧条、大屠杀的机制化和理性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等等。阿多诺对于其切身经验,以及对于既存现实以及其中人的生存,从未有意闭上眼睛或停止批判的审视与警醒的思考。一个对比鲜明的例子就是:在阿多诺热情洋溢的阐释勋伯格、贝克特等现代主义作家之时,现代主义文艺运动却一直是斯大林以来的苏联所严厉批判的对象。

阿多诺对于“奥斯维辛之后”的判断具有“非同一性”的强烈意味。在提出“奥斯维辛之后”的判断十三年之后,阿多诺依然坚持“不软化”<sup>[7]</sup>自己的立场,然而,当“是”(is)被置换为“是”(would be),阿多诺关于“野蛮”的判断就已经软化了;<sup>[8]</sup>四年之后的《否定辩证法》则写道:说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这也许是错误的,但问奥斯维辛之后能否继续生活,却并不为错;<sup>[9]</sup>次年的论文又将上述判断表述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的不可能性”问题。<sup>[10]</sup>上述细微变化恰与其《文学笔记》的写作时间同步,表明否定辩证法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微妙张力,这似可从他的贝克特批评中约略见出,而对于勋伯格的阐释则是给出了音乐学的佐证。首先,“奥斯维辛之问”也预设曾经不野蛮的写诗时代,而依《启蒙辩证

法》，即便在这不野蛮的时代里也早有走向野蛮的种子被埋下，因而，除了那个作为讨论主体与客体、自由与必然等问题的“非同一性”可能性之外，阿多诺便不再承诺什么——资本意识形态正与人类中心主义分享“监禁思维”<sup>[11]</sup>的快乐，而历史唯物主义的乌托邦承诺业已扬弃；其次，文学艺术尚存某种可能的希望，阿多诺却又将这种可能安置在一个解构其自身的基础之上，但并不能由此推论他具体的文学批评，或者相反；再次，文学批评贯穿于阿多诺哲学思考的一生，然诗与哲学的争吵之于阿多诺并非问题，哲学中的理性同一性批判与诗学中的批判精神的揭示实为硬币两面，这在阿多诺的文学批评所关注的德法作家作品<sup>[12]</sup>中——从巴尔扎克、狄更斯、本雅明到勋伯格、贝克特等——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阿多诺并非如迈耶尔所云隐秘地怀有对于历史的敌意，事实上却抛弃了否定与矛盾范畴。<sup>[13]</sup>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阿多诺只是简要概括了他在《文化工业》一文中的看法，并不存在另外的“再思考”，也不存在从《启蒙辩证法》的退却；批评阿多诺退却者实际上受到《文化工业再思考》英译本的某种误导：阿多诺以虚拟语气指出，人的解放作为时代生产力量发张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化工业对此的阻滞，那么自主的个体的存在是可能的——但是，这里的虚拟语气忽视了，结果这成为阿多诺抛弃对于时代的批判的根据，仿佛是阿多诺认为在现存资本主义语境中，人的自由与自主是可能的。阿多诺坚定地将先锋艺术作为真实经验的唯一飞地，而且他十分清楚艺术的灵韵在当下消费社会中存在的危险。<sup>[14]</sup>就此而言，那种认为阿多诺与其将艺术的乌托邦联系于绝对的否定、毋宁说联系于艺术的肯定意识形态功能的观点，同样是不公正的。

质言之，否定辩证法自无需夸大，否则其自身也将成为非同一性逻辑的批判对象；而否定辩证法与文学批评间的游移与其说是理论的一个裂隙，毋宁说是理论所指的一种必然。奥斯维辛之后的诗学追问服从于批判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不论这一担当是否开启后马克思主义时代，抑或原本就属后者思想史上的一个环节，可以确信的是，阿多诺不会无视文学世界以及文学共同体的现实新变，一如他独具慧眼地发现随笔文类根基处的“异端”、<sup>[15]</sup>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格面具”。<sup>[16]</sup>奥斯维辛之问在其文学批评文本找到某种线索，从而使指向网络文学的阿多诺批评设想可以简约为两个层面：一是“奥斯维辛之后”的文学批评，一是“奥斯维辛之后”的历史与现实——机械复制时代、电子时代、大数据时代。

## 二、“奥斯维辛之后”的文学批评

奥斯维辛之后的文学艺术无非垃圾，阿多诺的判断在今天听起来并不陌生，因为网络文学也曾享有同样的标签。将这样的网络文学批评归于值得怜悯的“精神错乱”，与将网络文学视为文学的未来一样，皆值商榷；但如若因此得出“网上网下”“原本就是一个东西”，<sup>[17]</sup>那也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差异。阿多诺的野蛮论或垃圾论显然迥异于当下关于网络文学的某些批评，而吊诡的是，后者却往往从阿多诺哲学理论与美学理论那里寻找某些言之凿凿的理论支撑，似乎阿

多诺再世,他也将毫不犹豫的把诸如《网逝》《成长》《遍地狼偶烟》《青果》《从呼吸到呻吟》《国家脊梁》《办公室风声》《刀子嘴与金凤凰》<sup>[18]</sup>等这样一些网络文学作品(小说)丢入垃圾堆,并厉言指斥其野蛮。看起来这颇为契合阿多诺逻辑,但事实上却可能过于简单化了。

阿多诺无缘见证1970年后的文学世界,更无从想象肇始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网络文学批评,<sup>[19]</sup>但即便丢开关于文学艺术的哲学思辨与伦理关怀,那丰富的文学批评文本也为我们讨论阿多诺如何面对网络文学提供某种指引。当然,前提是复杂的看待其文本复杂性:文学批评被视为美学理论的核心要素,反过来,后者又成为前者的核心角色,<sup>[20]</sup>而其间阿多诺“独特的个人气质、行文习惯以及所惯有的自相矛盾”<sup>[21]</sup>亦值警惕。认为阿多诺将《美学理论》“献给萨米尔贝克特”<sup>[22]</sup>不无偏颇,而说贝克特及其剧作常常游走于阿多诺学术话语之中却并不为过。阿多诺对贝克特作品不吝赞誉,认为它们“揭露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真面目”,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sup>[23]</sup>并在《否定辩证法》中屡屡涉及。既然阿多诺宣称美学必须专注于每件作品的研究,那么通过他的文学批评文本《理解〈终局〉》来简要考察他的文学批评该无不妥。

剧作《终局》晦涩难解,迥异于传统戏剧文本,而阿多诺的批评与阐释同样异于寻常。当然,对于这一判断,阿多诺将不予认可,因为对于《终局》晦涩难懂的指责,本身就已是小资产阶级保守主义的表现,它既造成了内容—形式的对立,又以同一性逻辑造成虚假的统一:前者拘束于某种理想形式标准,后者流于空洞和无偿的游戏”。<sup>[24]</sup>在阿多诺看来,理解《终局》仅仅在于理解它的不可理解性、它的无意义性。<sup>[25]</sup>贝克特拒绝哲学的可能性,也拒绝理论的可能性,然而,如若文学批评旨在揭示出艺术真实中的社会真实,那么,作品本身及其阐释就绝非可有可无,但此阐释却非彼阐释,这首先根源于关于现实的认识。依阿多诺之见,即便之于巴尔扎克,所谓现实也非萨特意义上虚假的“人类处境”,而应是那个先在的被管理的总体性,因而《终局》与其说分享存在主义的理论实践,毋宁说以荒诞性、游戏性完全颠覆了前此以往的戏剧模式,以及诸如寓言式或象征式戏剧批评的可能性。阿多诺断言,如果文学本身的死亡成为批判与否定的唯一可能的表达方式,文本的无所意义正是它唯一的意义。<sup>[26]</sup>以《终局》的语言问题为例,语言无法超越历史与逻辑,甚至语言本身都难免“同一性”嫌疑,但这是人类无以避免的代价。正如勋伯格的音乐艺术特征鲜明的节奏与沉默,语言及其沉默本身业已成为戏剧内在部分,《终局》中哈姆与克劳夫无聊琐碎的絮叨、前言不搭后语,在此语言千疮百孔,戏剧走向反戏剧,而后者却成为前者存在的唯一意义。

语言与经验、现实构成了《理解〈终局〉》的基本线索,贯穿于阿多诺文学批评之中。比如随笔就被阿多诺认为是以无规范、无传统的自由形式,反抗柏拉图以来的陈腐教条,刺激一直臣服于外部权威的德国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sup>[27]</sup>对此,进一步的概括来自于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的判断:艺术是经验生活的模

本、现实生活应该模仿艺术。这里的艺术自是现代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作品被阿多诺视为经验生活的模本，乃是源于经验现实本身已经沦为同一性逻辑的被损害物，而艺术作为被损害的经验现实的创伤记忆则成为否定性的表征；而现实之所以要模仿艺术，则是源于现代主义为经验生活提供了非同一性的经验模式，以自己的现实性证明了在同一性世界中那种非同一性存在的可能性。这就与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美学理念针锋相对了，现代主义艺术既反对追求的绝对真理，也反对反映客观的现实，根源都在于既定现实的“被管理性”本身。

由此看来，即便阿多诺的网络文学批评依然无法设想，但当面对当下的网络文学世界时，他大约不会简单判之以“垃圾”或斥其“野蛮”，而是会在艺术作品、文学世界与既定现实之间寻求理论的阐释与批判。也许，下述问题大约会进入他的视野：第一，网络文学滋生于怎样的现实世界之中？“同一性逻辑”的统治已被弱化还是强化？在这样的世界中，网络文学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的？是同谋还是拒绝？第二，网络文学经验是真实的吗？它在何种意义上真实或者虚假？非现实的经验与现实经验构成怎样的张力？第三，在作品的语言及其形式上，网络文学具有怎样的特质？它对于接受的迎合或者拒绝意味着什么？一言蔽之，阿多诺追问的核心将是：网络文学在何种意义上指向“同一性”逻辑下“活得正确”？

### 三、“奥斯维辛之后”的后面

阿多诺的文学批评富有魅力，却又拒绝阐释。<sup>[28]</sup>其批评文本甚至对于同一对象，其批评观点也屡有抵牾。这或许暗示了哲学/美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裂隙，以及“非同一性”辩证法的理论压力——一种“阿多诺性”。但如果抛弃从其批评实践推演其文学思想乃至美学与哲学思想的野心，而是返回到创作这些批评文本的1960年代，<sup>[29]</sup>在现代阐释学的启发下做出指向网络文学批评的某种当下理解，这未必会遭到阿多诺的反对——美国学者詹姆斯把阿多诺阐发为“20世纪90年代的辩证法楷模”“我们时代的分析家”，<sup>[30]</sup>无疑是有力的例证。返回“奥斯维辛之后”文学批评的历史维度，是为了寻求走向当下的道路。正如艺术灵韵的消失至于本雅明意味着机械复制时代的存在，阿多诺的文学艺术的批评，即便是其无法回避的精英主义倾向，也实实在在的和电子时代所带来的新经验联系在一起。“奥斯维辛之后”或许就从机械复制时代、电子时代、大数据时代一路延伸到当下了。

如果说可以将六十年代简约化为一个词组，这大体可以借用杰伊的描述——“充满希望的‘穿越制度的长征’”。<sup>[31]</sup>今天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了，充满希望的穿越努力由于分享奥斯维辛的深刻哲学与社会学地基而终于停滞，并陷于漫长的徘徊之中，这或许更见阿多诺的清醒与深刻。就此而论，哈贝马斯关于阿多诺“对战后的民主成就与社会话语的交往性结构的重要性无动于衷”<sup>[32]</sup>的说法，可能难免偏激。所谓“创伤性僵持”，与其说是拘束于“奥斯维辛

的震惊”而难以走出的表征,毋宁说是理论对于现实的持之以恒的当下审视的一种担当。具言之,这种当下审视,表现在其文化工业理论中,是对于电子文化的批判,“是以印刷又化培育出来的自律主体的身份向整个电子文化的宣战”;<sup>[33]</sup>表现在文学批评中,则是珍重主体自由意志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文学批判潜能的“诗意性”发掘:二者统一于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既定现实的坚定批判。无论是对于巴尔扎克的批评,还是对于浮士德的解读,抑或关于外来语和随笔的讨论,阿多诺都是在文学作品及其语言中寻求批判的力量与潜能。

事实上,即便在“奥斯维辛之后”后,以印刷文化批判电子文化的阿多诺,却早已经面临批评主体身份的现实危机,用齐格蒙·鲍曼的话来说,就是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转换,<sup>[34]</sup>对于此的麻木,恰凸显知识分子的狂妄与乖张的精英主义姿态,阿多诺似尤甚。而更糟糕的是,在“奥斯维辛之后”的更远方,社会生活一似狂飙突进,电子时代—信息时代—大数据时代,美国学者约翰·布朗关于信息时代的人们总是把未来植根于历史、结果倒退着走向未来的判断<sup>[35]</sup>言犹在耳,世界已进入了大数据的时代——一个“爆炸”“海量”等任何大词都不足以描述数字化信息的时代。<sup>[36]</sup>至于这样的时代是否会影文学及其存在形态,于今当不是一个有待争论的问题了吧?

然而,对于阿多诺来说,文学批评又将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当他尚在思考电子时代已经使“小说丧失了许多传统上原本属于它的表现对象”<sup>[37]</sup>时,他又该如何面对大数据时代已经开始了的3D打印复制/制造现实?如果说,阿多诺的文学批评难免以印刷时代的存在方式面对电子时代的小说乃至文学整体,那么,他会继续将那个时代的眼光延伸到当下时代的网络吗?比如,他是否会坚持对卡夫卡、贝克特文学作品的偏爱?继续津津乐道于本雅明或者语言与形式?抑或“诗歌的萎缩”及其意蕴?如此等等,我们的确不得而知,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阿多诺绝不会对于他“终生思考”的文学世界漠然视之,也不会对他处身其中的现实世界及其之中的人的生存现实视而不见;或许他依然倒退着面向未来,但他也不会放弃关于未来的想象,不会放弃关于如何才能“活得正确”及其与文学关系的思考。或如英国学者瑟伯恩所言,“现在,在有一个世纪末颓废期之际,法兰克福运动得以重视。阿多诺的言论更接近于2008年而非1968年的激进情绪:‘一度被看作过时的哲学仍继续存在,因为实现它的契机已经错过。关于它只是曾解读世界的简要评判……在改变世界的努力失败后成为理性失败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批判理论总是一个转喻词。”<sup>[38]</sup>

“奥斯维辛之后”本身就是无限敞开的,阿多诺如若再世,想必他将执拗的坚持文学的批判立场,坚持自己关于文学与审美的期望,以及这一期望之于人的意义,而这一切都必然“创伤性僵持”地植根于他关于当下生存的审慎判断的基础之上。正是在此意义上,詹姆逊才意味深长的说:奥斯维辛之后的诗学问题,在当前,已经被“能否忍受在游泳池旁边阅读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问题所替

代”。<sup>[39]</sup>如若联系阿多诺在中国当下的处境,以及考虑到其文学批评文本之忽视的状况,那么詹姆逊的判断可谓切中肯綮。至于他是否会再出版一本关于网络文学的文学批评著作,或者加入“网络文学研究学会”,那倒是真的不得而知。质言之,阿多诺及其批判在中国无论是活着、死去还是正在死去,无一不是当下文学现实的症候之一;面对当下的网络文学,阿多诺的文学批评想来定不会停留于自说自话或自娱自乐之中。

#### 四、结 论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并非描述意义与经验的历史性质,而是要探查经验的普遍结构与条件,因而理解我们与世界发生关系的结构性条件至为重要,<sup>[40]</sup>恰如他的文学批评正是作为对于文学现实与文学世界的直接面对。就网络时代的文学批评而言,即便文学艺术不可能抵抗商品化和消费主义浪潮,这也不是径直取消文学艺术政治与社会维度的借口,阿多诺对此一直高度警惕,而他的许多判断本身也从未拒绝批判性反思。阿多诺之后的文学实践在“奥斯维辛之后”无限敞开,而他仍将是反思如何直面文学世界的重要理论资源,也仍将面向他未曾见证的文学世界发言。<sup>[41]</sup>指向网络文学的阿多诺文学批评在“奥斯维辛之后”的文学批评层面,意味着在经验、语言与世界之间确立批判的视域,而在“奥斯维辛之后”的文学现实层面,则意味着理论的实践性必须植根于文学世界与社会生活的现实土壤。阿多诺的网络文学批评当秉持文学批判立场以及文学对于个体生存的关照,他对于文学社会学的深刻思考也当横亘于当代学者面前。

#### 注释:

[1] A. 霍耐特:《“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致辞》,载《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阿梅龙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页。

[2] 马丁·杰伊:《〈辩证法的想象〉中文版序言》,张晓明译,《哲学译丛》1991年第5期。

[3] 除了詹姆逊等个别学者,中西学界关于阿多诺的研究皆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其文学批评文本(德文四卷本、英文两卷本),至多将其视为哲学理论与美学理论的文学例证——当然割裂它们之间的整体关联更为盲视;新世纪以来有所改观,代表性研究专著有:Ulrich Plass. *Language and History in Theodor Adorno's Notes to liter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2006. David Cunningham & Nigel Mapp. *Adorno and Literature*, 2006.

[4] Adorno. *Prisms*. MIT, 1981, p. 34.

[5][9][11] 阿多诺:《否定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367、363、45页。

[6] 佩里·安德森将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引入英国,以激发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从而与以汤普森为代表的强调“本土经验优先”的英国第一代新左派针锋相对。现在看来,安德森的过于强烈的实用主义逻辑可能忽视了阿多诺理论的经验性与本土性。参见: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张亮《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P·汤普森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7][15][16][25][26][27][37] Adorno. *Notes to Literature* (vol2), trans. , by Weber Nichol森, New York, 1991, pp. 87, 23, 122, 243, 261, 10, 3-4, 31.

- [8] Howard Caygill. Lyric Poetry before Auschwitz. in Adorno and Literature, ed. , by David Cunningham & Nigel Mapp, 2006, p.70
- [10] Adorno, Can One Live After Auschwitz? A Philosophical Reader, Stanford, 1997, p. 387.
- [12] 耶格尔认为,阿多诺不乏英美国家的生存经历,而其文学批评却独钟情于德法作家作品,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参见:洛伦茨·耶格尔:《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陈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2页。
- [13] Andress Huyssen. Introduction to Adorno. New German Critique, 1975(6), p. 3.
- [14] Leo Lowenthal. Critical Theory and Frankfurt Theorists .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 1989, p. 58.
- [17] 陈村:《〈网络文学之星丛书〉序言》,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3页。
- [18] 这些作品曾先后入围鲁迅文学奖与茅盾文学奖初评,但都最终落选。
- [19] 依欧阳友权先生考察,新世纪之初,第一篇汉语网络文学批评权威期刊论文、第一篇长篇研究报告、第一部理论专著、第一套网络文学研究丛书就已出现。参见:欧阳友权:《当传统批评家遭遇网络》,《南方文坛》2010年第4期。
- [20] David Cunningham & Nigel Mapp. Introduction. in Adorno and Literature, ed. , by David Cunningham & Nigel Mapp, 2006, p. 1
- [21] 乔国强:《语言与形式:阿多诺文学思想中的核心问题》,《英美文学论丛》2008年第1期。
- [22][24] 杰木乃兹:《〈阿多诺:艺术、意识形态与美学理论〉前言》,载《阿多诺:艺术、意识形态与美学理论》,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4、181页。
- [23] 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6页。
- [28] Ulrich Plass. Language and History in Theodor Adorno's Notes to liter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2006, p. xxii.
- [29] 《文学笔记》中的文学批评论文发表时皆为德文,就四卷本德文文本而言,前三卷发表于1958-1965,第四卷为身后出版,写作时间不早于前三卷。
- [30] F. 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或辩证法的韧性》,李永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9页。
- [31] 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序言第14页。
- [32] 克里斯托夫·图克:《霍克海默、阿多诺与20世纪的解构性》,载施威蓬豪依塞尔等:《多元视角与社会批判:近日批判理论》,鲁路等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8页。
- [33] 赵勇:《印刷文化语境中的现代性话语》,《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 [34] 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页。
- [35] 约翰·布朗、保罗·杜奎德:《信息的社会层面》,王铁生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10、1页;关于社会层面上的信息时代的几种态度描述和剖析,参阅该书第2-6页。
- [36] 参阅:Bill Franks:《驾驭大数据》,黄海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郭晓科:《大数据》,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 [38] 戈兰·瑟伯恩:《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孟建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7-88页。
- [39] F. 詹姆逊:《晚期马克思主义》,李永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5页。
- [40] Brian O' Connor,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 Philosoph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ritical Rationalit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p. 173.
- [41] J. M. Bernstein et al, Art and Aesthetics after Adorno, Berkeley: The Press of California University, 2010, p. 7.

[责任编辑:黎虹]